

古往今来，情报一直是兵家必争的重要资源。战场上，作战双方情报工作的开展直接影响着各自战略部署和军事行动的成败，是决定战争局势变化的关键因素。我国古代历史上有许多因情报制胜的经典案例，这些案例对于做好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军事情报工作，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资料照片

汉：情报支撑战略决策

据《史记》记载，汉武帝继位初期，地处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匈奴是汉朝的心头大患。匈奴作战勇猛、善于突袭，时常派兵侵扰汉朝边境，对当地百姓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威胁。公元前 129 年，面对匈奴铁骑再一次南下挑衅，汉武帝决定分派四路大军全面反击，但除了名将卫青率领的一路大军略有斩获外，其余三路皆以失败告终。

汉朝将领在对战争失利的反思中认识到，情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由于缺乏准确有效的情报，汉军往往在出击前对敌人的兵力、装备不了解，甚至连自身和敌人的具体方位都难以确定，因此很难作出科学的作战计划和行动部署。好在情况出现了转机。

其实，早在公元前 138 年，汉武帝就曾公开招募使者张骞出使西域，希望在寻找联合抗击匈奴的部落势力的同时，进一步掌握西域情况。最终，张骞克服重重困难，历时 13 年终于为汉朝带回宝贵的西域地图和丰富的敌军情报。自此，胜利的天平开始向汉朝倾斜。

公元前 123 年，卫青率六路大军两次进攻匈奴，张骞利用沙漠行军经验和掌握的地理知识，为部队行军布阵、安营扎寨提供意见方案，对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汉朝又先后发动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极大地削弱了匈奴的军事实力，加强和巩固了边防建设，促进了与中亚、西亚各国的友好往来。这其中，张骞提供的地图和情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记》高度评价张骞“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盛赞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具有“凿空”之功。

宋：情报保障军事安全

宋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朝代，但由于长期坚

持重文轻武的国策，军事发展相对落后，经常受到周边辽、金、西夏等政权的侵犯威胁。强敌环伺的复杂环境下，情报保密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据史书描述，宋代君臣在商讨国家重大事务时，往往都有一定的保密要求，至于军事领域的保密措施就更加严格。

首先，宋朝高度重视军事部署保密。据《武经总要》记载，宋朝法律规定，统帅将领等重要军事任命的诏书要由皇帝指派专人负责起草，军中号令传令官由主将心腹担任，粮草储藏等后勤供应有严密的保卫措施，刀剑、战马等武器装备禁止外传，兵马器械的使用都要履行审批手续。

其次，宋朝注重运用通信密码技术。据《翠微先生北征录》等史料记载，宋军军令传达使用专门的信符和传令文牒，并指定专人监督管理信符的启用和封藏，以防军情被窃或伪造。宋军还善于使用暗语隐瞒作战意图，甚至用诗文做“密文”来传递军情，密码通常只被将领掌握，因此即使传递人员被俘也不会造成泄密。

此外，宋朝严厉打击泄密人员。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对于擅自与敌军传递信件、被敌国收买拉拢等行为，主犯一律处以极刑，并视情况给检举者奖励。实践证明，如此严密细致的保密管理对于保障宋朝军事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军事实力较弱的宋朝能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存续 300 余年与此有着重要关系。

明：情报决定行动成功

锦衣卫是明朝创设的军政特务机构，主要从事对官吏军民的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服务巩固皇权统治。但据《宣祖实录》等史书记载，历史上的锦衣卫也曾承担打探军情、策反敌将等职能，甚至在一些战役中有过突出的情报贡献。

情报制胜的经典案例

1592 年，刚刚结束战乱、完成统一的日本突然派兵入侵朝鲜，企图以朝鲜为跳板，对中国国土有所图谋。朝鲜因兵力孱弱在战场上连遭惨败，被迫向宗主国中国求援，万历皇帝收到消息后决定发兵援朝，史称万历朝鲜战争。

受朝鲜不实情报误导，早期入朝明军严重低估了日军数量和武器装备，加之粮草供应不足，导致初战不利，折损众多将士。于是，明朝调整策略，在全国调集 4 万精兵准备开赴前线。然而在大军集结之时，明军对敌情的掌握仍然较少。如果不能在有限时间内进一步掌握实际战况，必将影响明军后续军事安排。

紧要关头，锦衣卫临危受命，迅速深入朝鲜、日本等地搜集军情，在很短时间内摸清了日军行军路线、兵力配置以及作战特点等重要情报，甚至连对方粮草给养地点都有详细记录。锦衣卫将搜集到的日本情报整理成书籍《倭情备览》，该书成为明军将领必读日本情报书，时任明军总指挥杨镐也常备此书，甚至将此书送给朝鲜官员，助其了解日本国情。

待 4 万大军正式向朝鲜进发时，明军已通过锦衣卫精心编织的巨大情报网，对战场对手有了充分了解，这为日后两国通力协作、痛击日军，最终取得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情报信息保障。

(来源：保密观)

古代公文 保密工作

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始终将公文保密工作视为“御天下”“临民治事”的必备工具。公文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维护统治、巩固政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保护公文的机密性，历代封建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从“泥封”制到“密奏”制，不断升级保密手段，严防死守机密文字材料。

公文作为公务活动的产物，涉及政治要情和国家秘密。在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内保持信息不泄露，对统治者地位、政权运行的稳定至关重要。古代经典如《易经·系辞(上)》和《韩非子·说难》中早已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封建王朝统治者历来非常注重公文保密，从商朝的“守藏史”到清代的“军机处”，对公文保密的关注逐渐升级。在公文传递和保管环节，都需严格控制，以确保信息的安全。

文书是档案的前身，而文书的产生、流转、处置都离不开公文保密工作。在文书阶段，中央文书机构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朝代建立了各种文书机构，如秦朝的“丞相府”、两汉的“尚书台”、唐代的“中书省”等。这些机构负责政务处理、政情沟通，同时也是保证公文质量、安全和秘密的核心力量。在档案阶段，古代王朝设立专门机构来保管公文，如周朝的“天府”、宋代的“崇文院”、明代的“黄册库”等。这些机构为办毕公文提供了可靠的保护，加上严格的管理，使得公文的信息在得到保守的同时也得以保存。

公文管理的质量和效能直接关系到公文在专制统治中发挥作用的程度。为此，历代封建王朝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专门的公文制度，其中保密管理是一个重要方面。从秦汉的“书同文制度”到唐朝的《唐律疏议》，都对公文的起草、传递、保管等多个阶段进行了约束和规制。封建统治者通过法律对违规行为进行严格的惩戒，确保公文的安全。

公文保密系统逐渐从侧重某一方面发展至关注全程管控。在公文起草阶段，采用拆字法、隐语法、反切法等保密方法。在传递阶段，古人采用泥封法、斗检封、用印等方式确保公文信息的安全。在保管阶段，专职保管人员和机构为公文保密提供强大支撑。全流程管控系统为公文保密管理打下良好基础。秦汉公文制度为公文起草、传递、保管等阶段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为后来的朝代提供了借鉴。

古代公文保密工作对当代具有启发意义。在当前社会，公文依然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保密，但目的已从维护封建统治转向维护人民利益。因此，平衡保密与公开的关系成为当代的新课题。公文保密工作本身存在矛盾性，需要在保守秘密与交流信息之间寻求平衡。

(戚风 整理)